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社区规划实施评价

——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提要】：从城市规划实施评价的相关理论出发，基于曹杨新村的实证调查，以公共空间为视角，对社区规划实施评价进行了探索。以规划蓝图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性和一致性为分析的切入点，发现从差异性方面来讲，曹杨新村在长期的规划实施中没能注重对公共空间的营建，影响了社区公共生活的总体质量；而从一致性方面来看，新村的规划实施对社区当前的公共生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公共空间，社区，规划实施评价，曹杨新村

城市规划实施评价是规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贯穿了城市规划的全过程。在规划工作开展之前，做与不做，如何去等就是一种评价；同样，当这一工作已经结束，如果考虑一下做得怎样，是否达到了目的，是否产生了想要起到的作用等，则也是一种评价（孙施文，周宇，2003）。而对于城市规划本身来讲，由于其编制的层次和涉及到的内容繁杂，因而评价的方式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总规层面的战略型规划来讲，由于其政策性较强，因而会在评价过程中借鉴一些公共政策领域的方法；而对于操作层的战术型规划甚至更具体的详细规划而言，基于建成环境的实效评价则相对较为常用。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城市空间进行布局的基本单位之一。对于当代的中国都市来讲，社区通常可以大致分为传统邻里、工人新村、单位大院和住宅楼盘等几种类型。作为建国后早期建设的社区形式之一，工人新村在规划实施评价的研究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价值：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并由政府统一安排建设，且基本上完全按照规划蓝图进行实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几十年来市场化转型和都市空间的重构，使得这些老工房社区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古人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思是说，一件事物真正的好坏，需要在长时间的经历和磨砺之后才能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那么，对于这些亲历了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的工房社区而言，它们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保持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站在专业的角度，人们应当如何去评价，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笔者不打算进行面面俱到的“全景式”评价，毕竟对于社区而言，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那些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站在城市规划专业的角度来看，公共空间对于社区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正如卡尔（S. Carr）所言，它们不但是承载社区居民户外生活的主要场所，也为户外空间中所发生的日常生活构筑了社会交往的平台，它们使人们联合成社会（陈竹，叶珉，2009）。因此，对于社区层面的规划实施评价而言，公共空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

1 评价方法与标准

1.1 规划实施评价的分类

有关城市规划实施的评价的类型，西方已很多经典的文献对此进行了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塔伦（E. Talen，1996），她根据规划的不同阶段，将实施评价分为了4种类型：①规划编制中的备选方案评价（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plans）和文本评价（analysis of planning documents）；②规划过程中的规划行为研究（studies of planning behavior）和规划影响叙述（description of the impacts of planning and plans）；③规划政策分析（policy implementation analysis）；④规划实施结果的研究（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s）。很明显，由于笔者所关注的对象是作为建成环境的社区公共空间，因而采用的方法是前述分类中的第四类，即对于规划实施结果的研究。

而对于规划实施结果的评价研究而言，也有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国内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孙施文、周宇，2003）。在针对规划实施结果评价的综述中，主要涉及到了以下 5 个方面的评价方法：①在现代建筑运动主导下的终极蓝图式评价，规划实施被认为是将蓝图在城市土地上的照样实施，如能按照原样丝毫不差地实现就是最成功的实施；②威尔达夫斯基（A. Wildavsky）认为规划是控制人们行动结果的尝试，但由于仅仅是尝试，因而很难对规划本身的好坏作出客观评判，但实施评价可以依据结果与规划方案的契合度为标准；③塔伦（E. Talen）认为对于城市规划为什么（why）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关于城市规划究竟失败了什么（what）却没有大量的经验性根据。她在自己进行的实施评价研究中不但强调规划的实施程度以及规划方案与实施结果的一致性，还力图探明城市规划所带来的具体作用和实施影响；④以哈维（D. Harvey）为代表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学派则更为强调价值判断层面的评价，他们认为，公正和理性应当始终是规划实施同时也是规划评价的首要标准；⑤迈克林（J. B. McLoughlin）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的作用和“城市土地关系”等方面决定了城市规划实际作用的发挥，因此如果要全面地对规划实施进行评价，就必须建立一个城市究竟是怎样运作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框架，仅靠专业技术手段是完全不够的。

1.2 采用的评价方法与思路

从评价方法上来看，塔伦（K. Talen，1996）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但强调方案与实施结果的一致性，还强调了规划实施结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用和影响，这样的结果是否符合或近似原规划的意图，以此作为评价的准则，这对笔者的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就评价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由于笔者着重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进行评价，因而主要关注公共空间所产生的效用及其对社区公共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笔者以为，作为社区公共空间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评价内容：①公共意象与审美，包括社区的空间认知意象结构、视觉可识别性和环境印象等要素的变化；②公共生活与公共活动，即发生在社区的各类户外活动，即使这些活动没有发生专门的公共场地内，正如班纳杰（T. Banerjee，2001）所倡导的，作为规划师而言，人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公共生活而不仅仅是公共空间；③公共活动空间与场地，这是发生社区公共活动的专门的空间载体，但并不是所有的场地都能得到很好的使用，因为场地也有质量的好坏；④公共价值与社区精神，这是社区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展现，也是公共生活的价值基础。

基于以上的考虑，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

第一个方面是基于规划方案与建成环境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评价，即在原有方案基础上，基地的建成环境发生了什么突出的变化，哪些内容在实施中明显对规划造成了突破，这样的差别分别对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基于建成环境对规划方案的一致性所进行的评价，即原来规划方案中的哪些内容得到了较好的实施或延续，并在当前的社区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作用如何体现在社区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之中。

根据上述思路，笔者将以曹杨新村公共空间的实证研究成果为支撑，对曹杨新村的规划建设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

2 曹杨新村的蓝图与现实

2.1 新村规划方案概况

曹杨新村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始建于 1951 年，是解放后上海市兴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也是全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在多次的加建、扩建和改建后，已经成为了上海市区西部重要的大型居民住宅区。

曹杨新村在最初的规划中运用了邻里单位的思想（图 1），根据对相关史料的考证，曹杨新村的规划设计是由汪定增先生主持的。汪先生曾经明确地表示，新村在规划方案上不是像大家所以为的那样是“苏式设计”，而是彻头彻尾的“美式设计”。

在汪先生承担曹杨新村的规划设计任务期间，他依据自己在美国伊利诺伊期间住过的“Green Village Neighborhood Unit”的体验，将邻里单位引入到曹杨新村的规划设计中。规划界前辈金昌先生也参与了新村的规划设计，他提倡道路分级分类，住宅成组成团布置，在争取好的朝向的情况下，打破行列式布局的单调，并将原有的河浜组织在绿地系统中，使每幢房屋前均有绿地（邹尼尼，2012）。而从当时的规划方案（图 1）来看，新村在设计的手法上和环境的营造上都是非常成功的，在建成后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用日本建筑评论家斋藤和夫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漂亮、潇洒的西欧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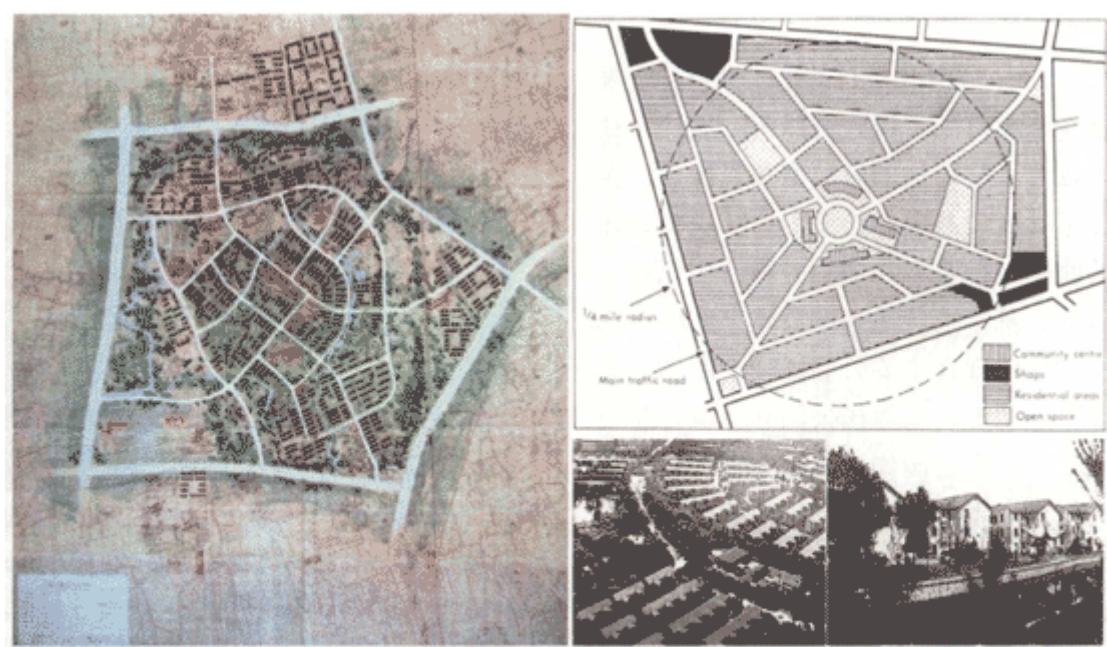


图1 曹杨新村的规划蓝图、规划理念及其早期的建成环境

Fig.1 The plan, the planning concept and the build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Caoyang Estate
资料来源：劳模营造社，曹杨新村城市设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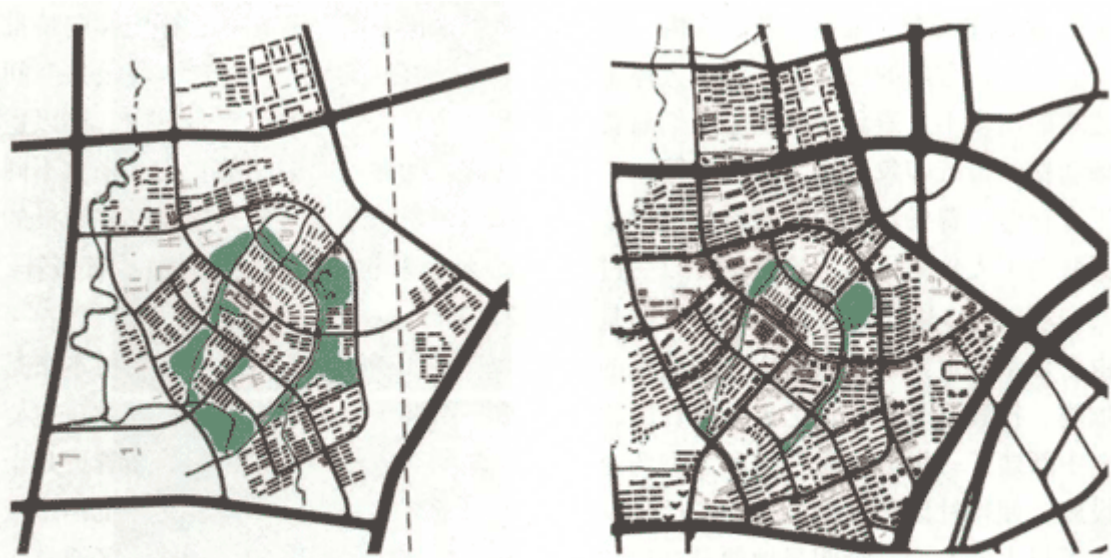


图2 曹杨新村规划方案和现状建设中的公共空间范围差异（绿色区域）

Fig.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itial plan and present situation on public space (gree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行绘制。



图3 曹杨新村现状中新建门禁小区和新建大体量建筑的分布
Fig.3 The layout of gated communities and large-scale buildings in Caoyang Estate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行整理和绘制。

2.2 现实中的差异性与一致性

而在接下来的 60 多年的建设中，特别是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商品化以来，曹杨新村在原有规划基础上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和新建，在延续原有规划方案部分特征的同时，也促使现实建成环境改变了方案中的空间愿景，造成了差异性。

从差异性上来看：①高密度住宅建设所导致的公共空间总量的减少，这使得社区人均所拥有的公共空间数量得到了压缩（图 2）；②门禁小区和大体量建筑的出现（图 3），这些门禁小区用地面积往往不大，但以高层为主，实行严格的门禁化管理；而高层大体量建筑除了门禁小区的住宅楼外，还包括了大体量的商业服务设施，这些对公共空间的影响都是非常明显的；③社区高密度建设对环浜滨水岸线空间的挤占，使得岸线空间变得支离破碎，也对社区公共空间带来了较为消极的影响。

而从一致性上来看，也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①邻里单位的结构和格局在规划实施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使得社区延续了整体化的内向型布局模式，保证了社区公共中心的活力；②现状总体的路网结构基本和规划方案的构想是一致的，基本按照最初的方案来实施；③一致性体现在主要公共活动空间的分布上，最明显的是曹杨公园和兰溪青年公园，这两个公园作为绿地的性质在最初的规划方案中和今天的现实建设中均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成为了社区主要公共活动场所。

3 基于差异性的评价

3.1 磨灭的印象：公共意象的重构

从公共意象的层面上来讲，大体量建筑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对曹杨新村的传统印象。作为建国后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建筑设计延续了苏联的工人住宅风格，这其中尤以一村的白墙红顶 3 层住宅楼最为明显，但是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新村中住宅建筑的加建、扩建和改建，加之近年来社区改造中新建了一批大体量住宅和大型商业设施，使得社区环境的公共意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明显地便是高层住宅楼对社区空间地标的重构，因为无论对于谁来讲，大体量构筑物在建成环境中往往是最先映入眼帘并对人们的空间认知产生重大作用的因素，影响和决定了人们对公共环境的感受和认知；而另一方面，大型商业设施的集聚使得社区中心显得活力十足，大量的人流和热闹的氛围使得进入新村的人们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社区的中心区域。而就在新村这个区域的旁边，作为上海式优秀历史建筑的曹杨一村虽然保留了“苏式小洋楼”的风格特征，周边郁郁

葱葱的绿化也为其增添了几分情趣，但这样的有较好识别性和可读性的视觉特征不得不在大体量建筑对空间意象的重构中和社区中心商业氛围的喧嚣中被无情地弱化，让人们进入曹杨新村后却很难体会到它的原有气氛，日本建筑评论家斋藤和夫先生所提到的那种曹杨新村曾经所拥有的“漂亮、潇洒的西欧风格”和“令人陶醉的舒展布局”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似乎已经很难体现出来。

3.2 新老的隔阂：公共生活的隔离

从公共生活的角度来讲，门禁小区在社区中的出现会导致社区社会关系与公共生活的隔离。对此，国外学者已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较早的如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其著作中认为门禁社区的围墙通常会被理解成一种空间隔离的手段，拉大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距离，由此增加了人们邻里交往的难度，在强化居民主观感知差异的同时给围墙内外的居民强加了心理障碍。而福克（W. Falk）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也对门禁社区所带来的空间私有化和破碎化倾向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门禁社区将公共空间转变为私人空间的过程是单向、难以逆转的，随着公共空间的丧失，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之间经验分享和积极的社会联系也变得困难起来（宋伟轩，2010）。

按照最初的规划，曹杨新村本来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工人新村，其住户主要是作为工人阶级的职工。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的改造，社区中新建了一批档次较高的门禁小区（图3），这些小区通常面积不大，且以高层为主，这些小区为社区带来了新的居住群体，增加了社区整体的多样性，但这样的多样性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却难以体现出来。笔者在曹杨新村公共空间的调研中发现，几位来自老工房住宅的居民用“有钱人”来形容那些住在门禁小区里的住户，并表示在社区活动中几乎很难看到他们的影子。调查还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在曹杨新村门禁小区中居住的住户，除了少部分的还迁居民外，大多数人均均为近几年才搬入，和老工房的住户们相比，他们更年轻，平时由于工作原因也很少在社区中参与公共活动，而老工房住户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平时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社区的公共活动，这使得社区新老群体在公共生活中无法产生太多的交集。

3.3 场所的破坏：活动场地质量的下降

从公共活动场地的层面上来讲，由于曹杨新村现状的建设密度较高，大体量高层建筑对周边公共空间更容易产生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日照和尺度方面。日照对于公共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尺度对于公共空间质量的好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盖尔（Jan Gehl，2010）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样，毁掉空间尺度无非就3个原因，太大、太高和太快。

最初的规划方案中，曹杨新村有大量的户外活动空间，其建设密度和高度都相对适宜，而目前的曹杨新村由于大体量高层建筑对原有社区环境的冲击却使得之前的情况有所变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位于曹杨环浜东南部桐柏公寓对面的健身活动场地便由于东向和南向的阳光被24层的板式高层大量遮挡，而其西侧又有茂密的行道树和街头花园，整个场地由于日照不足而显得阴沉而昏暗，其使用率极低。而在几百米开外，环浜杏杨院节点处的健身场地却在全天保持了极高的使用率，其场地面积、布局方式和设施类型与前者并无太大差异，通过问卷调查的信息整理发现，活动者来这里除了有六成选择健身以外，还有三成以上的活动者来此的目的则是为了晒太阳，由此可以推断出日照条件在公共空间使用中的重要性。另外一个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曹杨新村中心区普陀少年城前面的街头广场，经过长期的调查发现，这个广场除了儿童上下课时有大量的通过性人流以外，平时很难见到有自发性的公共活动，笔者认为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朝向的问题，由于该广场的朝向是正北，且南边的普陀少年城为一幢大体量的高层建筑，再加上东西向亦有建筑遮挡，因此该广场很难保证有充足的日照。普陀少年城街头广场另一个缺乏人气的原因，便是紧邻的高层建筑尺度过大，加之大理石的硬质界面过于生硬，人口的设计过于严肃，使得这里的空间环境显得不够亲切。相比之下，在其百米开外的曹杨影城广场却由于较好的日照和宜人的尺度，一直保持了较好的公共活力（图4）。此外，在几处环浜的公共空间中，高层建筑的毗邻使得尺度较小的滨水空间难以保证自己的吸引力，大尺度的体量顿时让原本小巧的水系成为了“水沟”，很少有人愿意停留在这里，滨水设施这样的情况在桂巷路北段的环浜空间中尤为明显。可以发现，大体量高层建筑的出现对周边公共场地的质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够激发邻里交往的社区小空间来讲，日照的缺失和尺度的不适使得很多社区场地难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3.4 岸线私有化：滨水连续性的丧失

连续性（continuity）是公共空间质量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卡尔（Carr）指出连续性指界定空间的界面连续整齐，而且不同的空间场所之间具有流线或者视觉上的联系，具备形成空间序列的可能性（杨震，徐苗，2007）。而在滨水场地的规划设计中，空间的连续性更为重要。戈登（Cordon）通过案例研究提出了成功进行滨水区规划设计的 5 条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协调好公共和私人的开发，以创造价值最大化的、连贯的城市滨水环境，而不是规划那些主观意义上的区域（Q. Stevens，2006）。

从曹杨新村最初的方案来看，社区中连贯的环滨滨水空间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其中的一些水系还渗入到部分小区，成为小区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从现状的建设情况来看，当前的环滨虽然水系是连成了“环”，但那些真正具备良好可达性的、能被公众所使用的岸线却在近几十年的建设中先后被一些专属的机构、设施和门禁小区所侵占和割断，真正留给大众进行公共活动的岸线并不多（图 5）。调查发现，以可达性为标准，目前环滨滨水空间大致可以分为 3 个类型：①所有人都能使用的公共岸线，具备良好可达性；②只能被少数社区居民使用的岸线，这类岸线通常需要从某个居住单位的人口进入后才能使用，由于紧邻居民的住宅因而属于半公共岸线；③被那些专门的机构或门禁小区所占用的，由于严格的管理而成为的专属岸线。值得欣慰的是，通过整理发现，公共岸线的长度在三者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其中内岸线占到了 53%，外岸线为 34%，相比之下，无论是在环滨的内岸线还是外岸线中，私人岸线的比例都不超过 30%。但无法否认的是，环滨连续性的丧失已经使得其滨水空间的价值和品质大打折扣。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样的环滨仅仅是主观意义上的一个“环形区域”，而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看，环滨实际已经被割裂成一条一条的滨水区段，有相当一部分区段在实际的使用中由于规模、尺度、环境、设施等原因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曾经被誉为的曹杨“绿色项链”已经是残缺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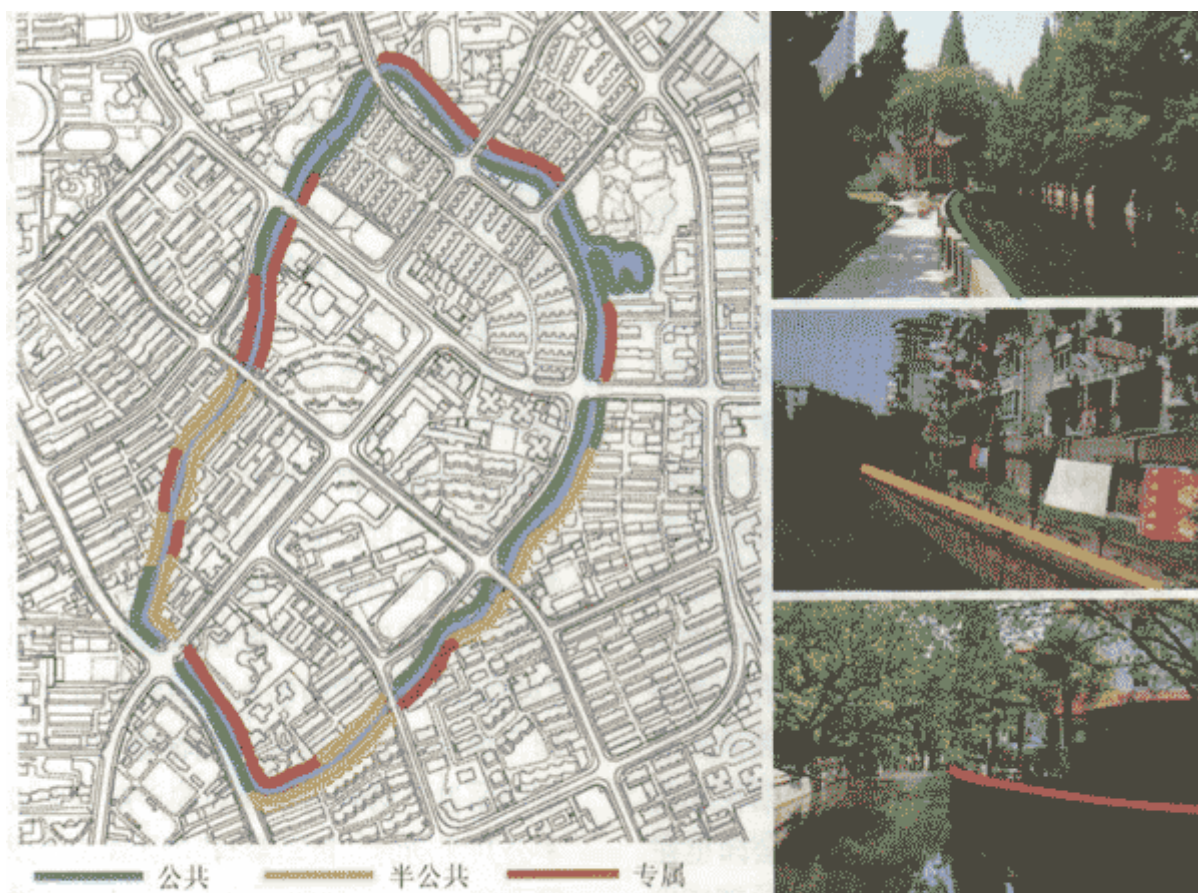


图5 环滨岸线空间的可达性分析

Fig.5 The analysis on accessibility of Huanbang waterfront public space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行整理和绘制。

4 基于一致性的评价

4.1 意外的成果：“规划”出来的“公共跑道”

2009 年，笔者在曹杨新村的调研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花溪路在傍晚的时候成为周边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一条“公共跑道”，特别是在兰溪路以北的一段，其活动密度比其他同类的道路高出许多，成为社区夜间最有特色的一条道路（图 6）。笔者在 2012 年的调查中随机对花溪路北段的 3 个断面进行了活动人流的交通量调查，发现这 3 个断面的平均交通量约为 11 人次/min，也就是说，基本上每隔 5.5s 便有一位活动者路过。这样的使用强度似乎已经可以和很多学校的操场跑道相比较了，而这条花溪路的场地条件远远不及专用跑道的质量。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看，花溪路被周边居民当做夜间“跑道”至少已经超过了 10 年，由于这里在晚上没什么车流，加上环境优美，因而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此锻炼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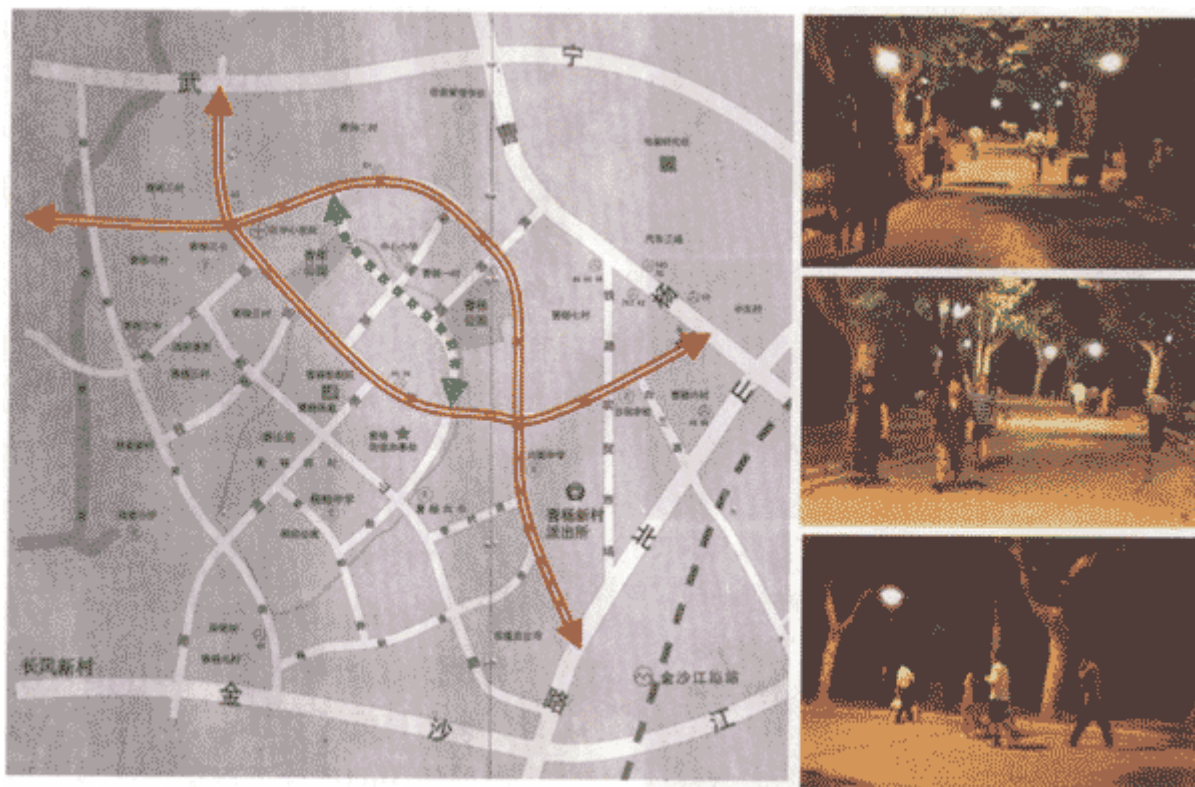


图6 曹杨新村花溪路的位置（绿色虚线）及其夜晚的锻炼活动

Fig.6 The location of Huaxi Road(green line) and its public activity in the evenings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自摄。

曹杨新村在最初的规划中由于采用的是邻里单位的思想，因而在某些道路线形的设计中运用了弧形的要素，这样可以在减缓过境交通速度的同时，最大化地保证社区生活的完整性。而正是秉承这种理念的两条道路——兰溪路和梅岭北路，造就了如今充满活力的花溪路（图6）。从图上可以看到，兰溪路和梅岭北路不但分别疏解了来自城市干路的车流，还通过“包夹”将花溪路“保护”在它们之间，几乎任何沿花溪路方向的车流都可以通过选择走这两条路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花溪路的车流即使是在白天也很少。此外，花溪路自身的环境几乎是最初的规划方案的延续：三层楼的曹杨一村几十年来一直都陪在花溪路两侧，曹杨公园和兰溪青年公园也在用地性质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环浜滨水空间仍然和道路并行依偎，这些都使得花溪路在景观和尺度上显得十分宜人。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花溪路能作为社区“公共跑道”的前提有两点：一是道路建设对原规划方案中邻里单位道路设计思想的遵循，二是花溪路周边环境建设对规划方案的延续。像花溪路这样用途的社区场所，在如今这个人口高密度、公共活动空间缺乏、社区老龄化逐渐加剧的都市中显得尤其重要，而它却是60多年前的设计师们无意“规划”出来的成果。

4.2 邻里单位的造化：超越社区的广场

曹杨影城广场位于枣阳路和兰溪路的交叉口，是曹杨影城的附属广场，处于社区中心的位置，其周边集聚了大量的商业设施。调查发现，近些年广场上每天都会进行轮滑教学活动，其对象均为学龄前儿童，时间是从9:00-19:30，而在19:30以后还会有街道组织的跳舞活动，其参与者均为社区居民。这样长时间的活动成为了广场的一个“景点”，很多路过的人群都会因此在广场的坐憩设施上坐下或者驻足观看，这样的图景使得广场显得异常热闹。通过对广场白天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带小孩的受访者中大部分都是曹杨新村的住户，他们通常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里玩上半天的时间；而围观的人群则不然，受访者中有7成的人来自曹杨新村以外，而他们到此的主要目的基本都是进行消费活动，如购物、看电影和吃饭等（图7）。他们路过

广场时通常会观望一阵，形成了公共活动的“被动参与”，成为了广场空间的另一类重要使用者，这也使得广场的服务范围扩大到了社区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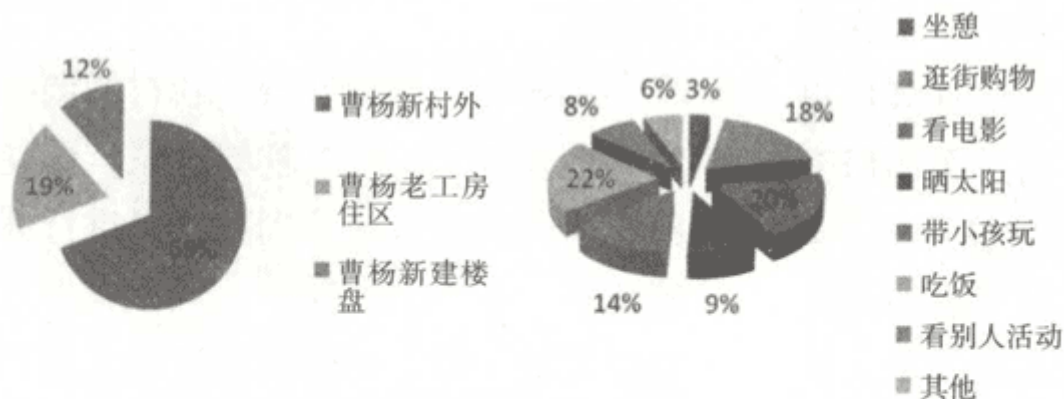


图7 曹杨影城广场受访者的来源及其活动的主要目的

Fig.7 The profiles of respondents in Caoyang Cinema Square and their purposes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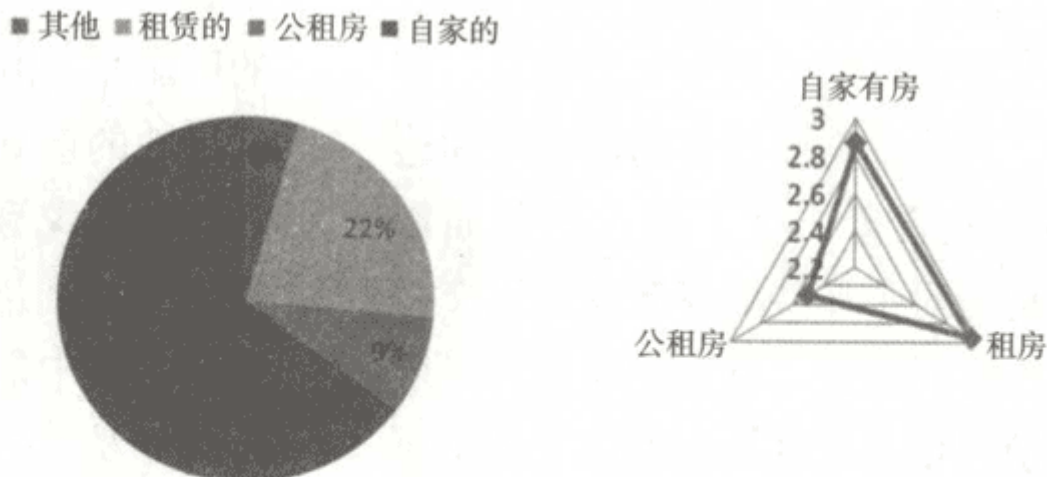


图8 曹杨公园受访者中公租房群体的比例及其交谈意愿程度

Fig.8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housing tenants among the respondents in Caoyang Park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talk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

笔者认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①社区中心公共设施自身的吸引力有保证，如曹杨影城和曹杨商城，其本身就具备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②规划方案中邻里单位的向心型格局强化了各类设施在空间布局上的集中，产生的集聚效应更大，使得广场拥有了更多的潜在使用群体；③良好的外部可达性，规划的兰溪路和枣阳路分别直接连接了周边的武宁路、曹杨路和金沙江路 3 条城市主要干道，加之公交线路的配合，使得新村外的居民能够方便地到达社区中心，增强了社区中心的多样性。可

以看到，正是由于曹杨新村在建设延续了方案中邻里单位的向心布局模式，以及按规划建设社区要道，才为这个广场今天的活力奠定了基础。

4.3 文化和精神的延续：公园里的“原住民”

作为曹杨新村最大的社区公共空间，曹杨公园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有组织的社区活动都发生在这里。调查发现，这里不但是很多老住户的活动空间，也有很多近年来新到曹杨的住户，他们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高档的门禁小区和对社区没有太多归属感的租房者，这使得整个公园有很强的混合使用特征。公共交往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公园中有接近四成的受访者称愿意主动与陌生人进行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退休老年人，以老工房住户为主。在这些愿意主动与陌生人交流的群体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公租房住户，从各类群体的交谈意愿程度分析结果来看，虽然比例不大，在受访者中占到了9%，但公园中公租房群体的交谈意愿远远高出其他的群体（图8）。而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公租房群体很乐意与外人分享曹杨新村的历史文化和自己在社区的经历，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强烈而纯正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另外，曹杨公园西北的兰溪青年公园也是一处重要的社区公共空间，虽然面积相比曹杨公园要小了一些，但也承载了大量的社区公共活动。

尽管曹杨新村近几十年来的住宅建设使得原有的规划理想面目全非，但上述两个公园绿地却依据最早的规划方案延续了下来，并成为了当前社区公共活动最主要的发生地，一方面，在环浜滨水公共空间处于半瘫痪的情况下，这两个公园几乎挽救了曹杨新村的户外公共生活；另一方面，作为规划方案的“原住民”，以公租房群体为代表的曹杨新村老工房住户们在公共空间的社会交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享受自己日常公共生活、提升公园公共活力的同时，还乐此不疲地为外来的访客传播着曹杨新村的历史、文化和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和曹杨新村的规划理想是一体的，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在今天的活生生的传承。

5 结语与展望

从前文的分析和评价中可以看到，现实与规划设想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对社区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一方面，从公共意象、公共生活及公共场地等方面来看，现实建设的差异性使得规划蓝图中所设想的公共空间的图景成为“世外桃源”，即便这样的图景在建设初期曾经为世人呈现了一段时间，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久远的历史档案了；另一方面，从一致性的角度来看，曹杨新村最初蓝图中的邻里单位布局模式、主要的路网格局和最初的社区公共精神，在一个甲子岁月的磨砺中得到了延续和传承，而且这些延续下来的内容至今还在默默地发挥作用，甚至在新的环境变迁中产生了新的作用。总之，从差异性的方面来看，新村的规划实施影响了公共空间的总体质量的提升，对社区公共生活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而从一致性的方面来看，新村的规划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公共生活展现出了新的特征，并对社区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曹杨新村未来的公共空间改建中，应适当保护和扩充上述能产生积极影响的空间场地，并通过相应的改造减少消极的公共空间，使得社区公共生活更加丰富而多样。

对于曹杨新村这一类的工房社区而言，由于数量较大，历史较为悠久，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拆除，因而在未来的都市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它们将成为社区更新和改建的重点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对工房社区开展规划实施评价便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实施评价，不但可以明了方案在现实建设中哪些内容被遵循了而哪些未能被遵循，还可以找到这些被遵循的和没被遵循的内容给社区生活分别带来的影响，以加深对社区规划方案与社区建成环境之间关系的认知。因此，此类评价工作的开展，对今后工房社区改建规划的编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工房社区乃至住区更新理论的完善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